

中国礼文化

邹昌林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1
自序	1

上编中国礼文化

前言	3
----------	---

第一章 中国为礼义之邦，“礼”为中国文化之标志	6
第一节 中国文化根于“礼”	15
第二节 秦汉之际古礼与新礼的交替	25
第三节 《礼记》对于研究古礼的价值和意义	34

第二章 从《礼记》看古礼的起源与整合	46
第一节 古礼是一个完整的表意系统	49
第二节 《礼记》对古礼起源的探索	61

第三节 古礼所反映的古代社会生活 78

第四节 古礼的整合与大同社会 129

第三章 从《礼记》看古礼的结构、功能和价值 155

第一节 古礼的类别和结构 156

第二节 古礼的主要功能及其内在统一性 167

第三节 古礼的基本功能与中国文明形成的道路 184

第四节 古礼的深层结构和功能 191

第五节 古礼的价值系统 214

第四章 中国文化为什么以礼为基础 259

下编 礼教与儒学传统

第一章 从《老子》对待文明的态度看儒道的异同及其
现代意义 295

第一节 《老子》思想的本质是反对文明的异化 295

第二节 从《老子》“为而不争”的思想看儒道的
异同 303

第三节 从儒道互补看《老子》思想的现代意义 313

第二章 儒学与宗教的关系 322

第三章 试论儒家礼教思想的人文价值 329

第一节 儒家礼教思想与古代礼教的关系 329

第二节 儒家礼教思想的人文价值 331

第三节 儒家礼教思想与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
关系 334

第四章 儒家《春秋》大一统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功能
试探 339

第一节 《春秋》大一统思想是儒家学说极富革命
批判精神的外王理想 339

第二节 二重变奏的历史结合——从《春秋》大一统
思想到汉代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形成 346

上 编

中 国 礼 文 化

前 言

从一定的角度来说，世界文化可以看做两大单元：一是原生道路的文化单元，一是次生道路的文化单元。所谓原生道路和次生道路，是指相对于世界第一代文明而言。迄今为止的世界性的文化，都是在世界第一代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凡是沿着世界第一代文明奠定的方向，独立或基本独立向前发展的文化，可以看做原生道路的文化。凡是第一代文明受到外部的压力和打击，发生中断或断裂之后再发展起来的文化，可以看做次生和再生道路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西亚、北非、南亚及欧洲地中海沿岸曾是世界第一代文明的摇篮，但都由于外部的打击而遭毁灭，以后重新发展起来的文化，已属次生和再生的文化，故可划为一个大单元。而中国文化，则由于高山、大洋和沙漠的阻隔，在汉代以前，一直独处一隅，基本不与外界发生关系。汉代以后，虽有佛教的东传，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然而在已经奠定了雄厚基础的中华文化面前，最后也只好俯首称臣，被中国固有的文化所改造，而融入中国文化的发展模式之中。直到近代以前，可以说，中国文化仍处于几乎完全独立发展的状态。所以，中国文化完全是沿着第一代文明奠定的方向，独立向前发展的，是一种原生道路的文化。正是因此，中

国文化号称世界的奇迹。故它与长期受着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各国文化一起，构成了世界文化的另一个大单元。

中国文化虽是一种原生道路的文化，但它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和影响，却并不限于本土和周围地区。从很早的时候起，它就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开始把中国的物质文明向外传播。唐宋间畅通起来的东南海上通道，加速了这种传播的速度。尤其是蒙古帝国的庞大版图，开启了中西物质文化大交通的时代。随中国物质文明大规模的外传，尤其是四大发明的西传，终于在异乡开花结果，揭开了世界近代文明的序幕，导致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随之，追逐财富的巨大动力，最终使近代西方文明的航船，驶进了这个东方神秘帝国的辖区。随着基督教的扩张，西方耶稣会士的来华，世界文化两大单元全面交通的时代才开始。中国古代灿烂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至此才完全地展现在西方面前。它无论从哪一方面，与西方文化相比，都显示着独特的光彩。因之，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国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古代文化站在一起，毫无逊色，都是最高水准的文化。故莱布尼茨称：“大陆两极端的二国，欧洲及远东海岸的中国”是“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文明”。但是，中国文化显示出来的完全独立的品格和特异性质，又使欧洲社会感到非常的惊奇。例如，中国文化发展的非宗教倾向和理性早启的特征，竟使欧洲启蒙思想家赞叹不已，并给他们反对欧洲的封建宗教和神学提供了另一种文化的榜样和范例。然而，中国

《莱布尼茨文集》，第78页，转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第225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85。

文化和民族的特异性质，又使他们感到那样的陌生。故莱氏又称，中国民族和欧洲民族为“最有教养和最隔膜的二民族。”既然如此，那么，作为古代最高水准的、长期影响周围各国发展的、且以其技术发明对世界进入近现代社会起过推动作用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它的功能和价值取向，是循着怎样的道路发展起来的呢？它具有着怎样的结构特征和价值功能系统呢？几个世纪以来，这一直是具有着无穷魅力而吸引着中外理论界和学术界的问题。何况，作为世界第一代文明仅存至今的子遗，作为几乎有古代科技约一半左右发明，却未能自行走向近现代科学的社会来说，中国文化更是一个巨大的谜。揭开中国文化生成之谜，对于历史科学来说，对于中国文化的未来和世界文化的未来来说，都将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正是因此，近年来，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倾向，就自然而然地日益深入到寻根索源的道路上去。本文在这里，也欲作一点尝试，冀希一孔之得，以就教于先知闻达。

《莱布尼茨文集》，第78页，转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第225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85。

第一章 中国为礼义之邦， “礼”为中国文化之标志

探讨中国文化生成之谜，首先涉及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是什么？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必须首先提出来。

关于这个问题，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才突出出来的。若不与其他文化，特别是与欧洲文化相比较，我们往往自己意识不到。故留意于此者，多为近现代学者。如梁启超说：

人类全体文化，从初发育之日起截至西历十五六世纪以前，我国所产者，视全世界之任何部分，皆无逊色。虽然，我国文化发展之途径，与世界任何部分，皆殊其趋。故如希伯来人印度人之超现世的热烈宗教观念，我无有也；如希腊人日耳曼人之瞑想的形而上学，我虽有之而不昌；如近代欧洲之纯客观的科学，我益微不足道。然则中国在全人类文化中尚能占一位置耶？曰能。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盖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坐是之故，吾国人对于此方面诸

问题之解答，往往有独到之处，为世界任何部分所莫能逮。吾国人参列世界文化博览会之出品恃此。

这是从学术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

严复在其译著《社会通论》序言中则谓：

异哉！吾中国之社会也。夫天下之群，众矣，夷考进化之阶级，莫不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乃还观吾中国之历史，本诸可信之载籍，由唐、虞以迄于周，中间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而所谓宗法，亦于此时最备。其圣人，宗法社会之圣人也；其制度典籍，宗法社会之制度典籍也。物穷则必变，商君、始皇帝、李斯起，而郡县封域，阡陌土田，燔诗书，坑儒士，其为法欲国主而外，无咫尺之势。此虽霸朝之事，侵夺民权，而迹其所为，非将转宗法之故，以为军国社会者欤？乃由秦以至于今，又二千余岁矣，君此土者不一家，其中之一治一乱常自若，独至于今，稽其政法，审其风俗，与其秀桀之民所言议思惟者，则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

这是从宗法性来看中国文化之根本特征的。

然而梁漱溟先生则谓：

只有宗法社会可说是家族本位，此见甄克斯《社会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1页，上海书店、中华书局，1986。

通论》。中国却早蜕出宗法社会，……此时必须用“伦理本位”这话，乃显示出中国社会间的关系而解答了重点问题。……

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相关系之人（父母、兄弟等），人生且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不能离社会），如此则知，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此种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伦者，伦偶；正指人们彼此之相与。相与之间，关系遂生。家人父子，是其天然基本关系；故伦理首重家庭。父母总是最先有的，再则有兄弟姊妹。既长，则有夫妇，有子女；而宗族戚党亦即由此而生。出来到社会上，于教学则有师徒；于经济则有东夥；于政治则有君臣官民；平素多往返，遇事相扶持，则有乡邻朋友。随一个人年龄和生活之开展，而渐有其四面八方若近若远数不尽的关系。是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

吾人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以至于一切相与之人，随其相与之深浅久暂，而莫不自然有其情分。因情而有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乃至一切相与之人，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联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它没有边界，不形成对抗。恰相反，它由近以及远，更引远而入近；泯忘彼此，尚何有于界划？自古相传的是“天下一家”、“四海兄弟”。试问何处宗法社会有此超旷意识？——宗法社会排他性最强。如只是家族本位，宗法制度，怎配把中国民族在空间上恢拓这么大，在时间上绵延这么久？要知家族宗法之依

稀犹存，正为其有远超过这些者，而非就是这些。

这是否定宗法，而强调伦理本位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也有反是，强调家族本位的。此不赘述。

除以上看法之外，尚有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为人文主义的；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的。还有从政治、法律上看中国文化之根本特征的。总之，种种看法很多，不一而足。然而，近现代中国学者之认识，由于生活于中国文化的具体环境之中，虽有其非常深刻的一面，但也因其沉溺于其中，而往往“不识庐山真面目”。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及其他文化的差别，决不是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差别，而是整体上的差别。如前言中所述，中国文化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大单元，所以，仅仅从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去谈问题，必然无法把握其全面的根本特征。故而，有时反倒不如置身于中国文化之外的西方学者看得虽浅近而全面准确一些。在这方面，法国的启蒙学者孟德斯鸠的看法，是具有代表性的。他说：

他们（指中国的立法者）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中国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了成功。中国人把整个青年时代用在学习这种礼教上，并把整个一生用在实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79～80页，学林出版社，1987。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12～13页，转引卢作孚《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中之论述。

践这种礼教上。文人用之以施教，官吏用之以宣传；生活上的一切细微的行动都包罗在这些礼教之内，所以当人们找到使它们获得严格遵守的方法的时候，中国便治理得很好了。



中国的立法者们主要的目标，是要使他们的人民能够平静地过生活。他们要人人互相尊重，要每个人时时刻刻都感到对他人负有许多义务；要每个公民在某个方面都依赖其他公民。因此，他们制定了最广泛的“礼”的规则。



在这方面，“礼”的价值比礼貌高得多。礼貌粉饰他人的邪恶，而“礼”则防止把我们的邪恶暴露出来。“礼”是人们放在彼此之间的一道墙，借以防止互相腐化。



中国的立法者们认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帝国的太平。在他们看来，服从是维持太平最适宜的方法。从这种思想出发，他们认为应该激励人们孝敬父母；他们并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313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78。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312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78。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313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78。

且集中一切力量，使人恪遵孝道。他们制定了无数的礼节和仪式，使人对双亲在他们的生前和死后，都能克尽人子的孝道。……

尊敬父亲就必然和尊敬一切可以视同父亲的人物，如老人、师傅、官吏、皇帝等联系着。对父亲的这种尊敬，就要父亲以爱还报其子女。由此推论，老人也要以爱还报青年人；官吏要以爱还报其治下的老百姓；皇帝要以爱还报其子民。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礼教，而礼教构成了国家的一般精神。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表面上似乎是最无关紧要的东西却可能和中国的基本政制有关系。这个帝国的构成，是以治家的思想为基础的。如果你削减亲权，甚至只是删除对亲权表示尊重的礼仪的话，那末就等于削减人们对于视同父母的官吏的尊敬了，因此，官吏也就不能爱护老百姓了，而官吏本来是应该把老百姓看做像子女一样的；这样一来，君主和臣民之间存在着的爱的关系也将逐渐消失。只要削减掉这些习惯的一种，你便动摇了国家。一个儿媳妇是否每天早晨为婆婆尽这个或那个义务，这事的本身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到，这些日常的习惯不断地唤起一种必须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感情，而且正是因为人人具有这种感情才构成了这一帝国的统治精神，那末我们便将了解，这一个或那一个特殊的义务是有履行的必要的。



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

正是有如孟氏之认识，故中国在世界上获得了“礼义之邦”的称号，“礼”成了中国文化之根本特征和标志。其实，“礼”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古人早有类似之认识，只是没有这样提出问题而已。如《礼记·曲礼上》讲：“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这里，“道德仁义”可以说是哲学伦理思想，“教训正俗”是习俗，“分争辨讼”是法律，“君臣上下，父子兄弟”是政治人伦关系，“宦学事师”是教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是军事，“祷祠祭祀，供给鬼神”是宗教。所有这些，都要“礼”来主宰，没有“礼”，就失去了这一切的衡量标准。这岂不是说，“礼”成了这一切的根本吗？《礼运》中更讲：“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其居人也日养，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礼”在这里。上则体现了天道的变化，下则体现了地上万物的生长规律，中则体现了人事变迁的法则。因此，“礼”是一切的根本。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是“礼”，而不是他者，这是其一。“礼”之所以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除孟氏所述。“礼”在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316页。

中国涵盖文化内容最广之外，还在于以下两点：

其二，“礼”在文化中起源最早，各民族都是如此。而在发展过程中，其他各民族的文化逐渐转入了宗教，整个中世纪，包括欧洲，都转向了宗教和神学。“礼”充其量只作为“礼俗”还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礼”在上层社会的交往中，也不过是限于礼貌的礼仪活动。“礼”在其他文化中，一般都没有越出“礼俗”的范围。而中国则相反，“礼”不但是礼俗，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与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法律、宗教、哲学思想等都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是从“礼俗”发展到了“礼制”，既而又从“礼制”发展到了“礼义”，礼俗、礼仪、礼制、礼规、礼义等，一直是中国人民行为规范的基本方面。所以，“礼”在中国文化中，不但起源最早，而且一直贯穿到近现代。这种特征为任何其他文化所没有，也为中国文化的其他任何特征所不及。

其三，中国文化的其他特征，往往都侧重某一方面，或侧重外在的行为方面，或侧重内在的精神方面，或侧重于内容，或侧重于形式。独有“礼”为诸方面之统一体。关于“礼”与其他特征之区别，可从包世臣《与杨季子论文书》而悟见一斑。其曰：“自唐氏有为古文之学，上者好言道，其次则言法。说者曰：‘言道者言之有物者也，言法者言之有序者也。’然道附于事而统于礼。子思叹圣道之大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孟子明王道，而所言要于不缓民事。以养以教，至养民之制，教民之法，则亦无不本于礼。其离事与礼而虚言道以张其事者，自退之始，而子厚和之。至明允永叔迺用力于推究世事，而子瞻尤为达者。然门面言道之语，涤除未尽，以至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则无以自尊